

黃寬重 著

南宋史研究集

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

黃寬重 著

南宋史研究集

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台一版

南宋史研究集

精裝一册基價 一五
平裝 一二元正

版權



所有

著者 黃寬重

發行人 高本釗

發行及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：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
電話：三〇六〇七五
門市部：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〇八號八樓
電話：三五一五二九
台北郵政三三六四三信箱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四〇六四九號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〇四四二一六號

代序——略論南宋的重要性

劉子健

學問首先要會提出問題，然後探討方法，收集資料，去尋求解答。牛頓要問蘋果爲什麼往下掉，才引起近代物理學的巨大發展。研究歷史正也如此。

黃寬重博士這本南宋史研究集有許多新貢獻。也許有的讀者不太熟悉南宋，不免要問南宋有什麼重要。

這可以從正反兩方面來說明。先從反面說。一般講宋史，動輒稱爲兩宋，容易誤以爲南宋延續北宋，並無多大的差異，不需要重視。其實不然。許多致力於研究宋史的學人，也多半喜歡北宋。從晚唐經過五代到北宋，有劃分大時代的基本改變，結束了千古以來的貴族社會，創建了士大夫領導的新秩序，氣象萬千。再看南宋，失地乞和，終於亡國，中興以後的君主，全都庸弱，權相把持，層出不斷，官僚腐化，苛捐重稅，雖然議論不少，終乏長策。這種情況，令人掃興，也就不去深究。

當然研究南宋其他方面的，大有人在，特別是文哲兩方面——詩詞書畫和哲學思想。不過，只講這些高超的文化，不問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的現實，未免架空。試想這現實如此不合理想，又怎樣會產生這些高超的成就？——這就是一項饒有興趣的大問題。

再從正面來說。開門見山，提出大胆的假說，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，是以南宋爲領導的模式，

以江浙一帶爲重心。先說地區，它是長江下游的南岸，從太湖四周往西往南，到江西浙江一片，再加上浙東到福建沿海的一窄條。張家駒先生有書，講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，文化中心也跟着轉移。應當再加重一下。南宋定都杭州，經濟更繁榮，文化更高。政治經濟文化都聚在一起，這重心是史所稀見的。同時，這文化的形態，也和前不太一樣了。

以這重心領導的文化模式，雖然起源於北宋，可是北宋在生長中，變化中，到南宋才又加改變而定型。姑且不去細說這定型的曲折歷程，直接從它的後果來看。不錯，南宋被蒙古征服。但是歐亞大陸到處被蒙古人攻破。能長期支撐，竟達四十餘年之久，除了南宋，還有那國？而且異族征服漢族的全土，這是破天荒第一次！結果怎樣呢？文化屹然不變。這模式不但定型，而且滲透民間，根深蒂固。不必多舉證據。元代漢族的風俗習慣，大致仍舊，而與學講授之風，反倒更盛，南宋模式的文化，已經成爲漢文化的大傳統。所以才有金華學派，以經世致用之學，輔佐明太祖，並且加意的尊崇理學，比南宋的文飾，落實得多。

這近八百年來的大傳統，南宋的文化模式，有些什麼樣的特點呢？這篇代序，只能挑些粗枝大葉，籠統的介紹一些。

(一) 背海立國的形勢。軍事上對北是不利的。第二代皇帝用張浚北伐，在符離大敗。第四代皇帝由得韓侂胄去輕舉北討，還是不利。從此南宋就不取單獨開戰。因聯合蒙古而重入洛陽，終於退到襄陽。苦撐對峙。雖然如此，北方時常有人投奔南宋，叫做歸正人。而在守勢中，也推進了新的軍事技術，例如守城的方法，興築塢堡和山水寨的防禦，都未可輕視，遠在歐洲之上。

黃博士的本書中，有好幾篇精彩論文，詳細考證這些方面。這篇代序，豈敢掠美？正如同影評，天機不可洩漏，把影片的故事先行透露，只能到此為止。由讀者自己去欣賞。

可是背海半壁，並非自固。著者還注意到南宋和韓國的接觸。（那時候日本的重心移往現在東京一帶，距離中國較遠，接觸較稀）。更重要的是南宋往大西南拓展。據黃博士說，他已經開始在研究。這又是大題目，久被忽略。來日的新貢獻，不卜可知。

(一)經濟的生長和穩定。蘇杭是天堂，連後來馬可孛羅都不禁首肯。其他都市，也大有可觀。雖然有物價波動，紙幣貶值的困難（世界上僅有的錢幣），大體能維持。而且對窮人，有若干社會救濟。這繁榮的基礎還在農業生產力向上，新種子和農技的發展。當然有許多豪富，兼併土地，又逃稅，又加租。貧富不均，盡人皆知。但是事實上並不壞到不堪設想。梁庚堯博士有本新書，南宋的農村經濟，指出佃農在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地位是一般的提高了。此外，還確有濟貧的善舉，緩和貧富懸殊。筆者曾指出南宋的劉宰，因病辭官，僅只是中型地主，而屢次自動救飢。有一次的粥局照顧了三萬多人，有石碑為證。在現代以前，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。可是他決不是特例，其他小規模的善舉，當然還有。基於這些以及其他情況，梁博士的書已經充分討論了，南宋初年以後，就沒有大的農民起義。許多小叛亂，多半是政治腐敗，官逼民變。近年別處有幾篇論文，指出在南宋較嚴重的是兵變，並非民變。和梁博士的理論，異曲同工。

(二)君權和代理相權的獨斷。北宋和唐代不同，一則君權提高，二則中央集權。但在中葉，言官和一些新起的士大夫，頗有發言權。甚至文彥博敢說，陛下與士大夫共天下！可是神宗用王安石變法，

及舊黨上台，排斥新黨。新黨再起，演爲元祐黨禁。彼此黨爭，君權獨高。到了徽宗，就已經有蔡京這類的代理權相。

劃時代的變化是南宋高宗。從渡江逃生，航海避敵（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）之後，居然能重整殘局，鞏固君權。外則乞和，內則釋三大將兵權，專任秦檜，罷黜異論，甚至殺岳飛，都是表現君權獨斷，不由士大夫來參預國計。用權相，多授權。等他死後，再收回這已經擴大了的權力，君權奇妙的比從前反倒更大。

韓侂胄不必說了。史彌遠代理君權，長達廿六年之久，是最高的記錄。而且廢儲令死，另立理宗，幾乎是冒充太上皇的角色。這君權及其代理，更是壓倒一切。正因太過火了，壓不住有些有正義感的士大夫，又不得不虛僞的文飾一下。起用幾位理學名臣，並沒有權。正式頒佈以程朱之學爲道統，而並不用於實際政事。無非標榜門面，借用聲望而已。

君主或代理的專政，南宋定型。再加上蒙古治下的專制，士大夫的實際政治地位，一蹶不振。明太祖的暴厲，勢所必至！明清以還，不必說了。

四 包容政治的控制。南宋君權高，而表面上不露骨。高宗從頭就學東漢光武用「柔道」。而青出於藍。最初是對羣盜，用收買手段，叫召安。後來對多數官僚，也採取頗有些近似的手段。姑名之曰包容政治。什麼意思呢？君主以及權相知道不得不用官僚，但雙方利益，常不一致。所以駕馭羣臣，用而不全信任。去之不必重罰，何妨另予安頓？有名的士大夫，籠絡以增朝廷聲望，但是無需採納他們的批評和建議。所謂「外有好士之名，內有拒諫之實。」

應付言官，最容易用來說明包容政治。北宋中葉，言風大盛，言官失勢，但因此朝廷也失去了許多士大夫的信心。南宋與這兩種方式都不同，用的是柔道。辦法很多。抗論的奏議，可以留中不發，即相應不理。也可以聽而不行，即表面敷衍。最妙的是抑言獎身，獎其忠君敢言。君、臣都享美名，而不發表他的批評意見，更不讓他再說。言官如果堅持，那就召見，溫諭他要顧全大體。勸他和宰相和解，名曰調護。實在不肯妥協，那就調職，另陞清高的職位，就不是言官了。反之，君主和權相還可以利用言官，示意他上章攻擊朝廷不再要留的人員。可名之曰御用御史。

君主用包容手段，權相亦復如此，以換取官僚們的擁護。會做官的人誰不明白這作風？其結果是官官相護，上下相瞻，少得罪人，得過且過。整個政府陷入重形式，少實際，不講效率，只辦例行公事等等的毛病。

談南宋的文化模式，還可以說其他各種特點。這代序。不擬多說，姑且略舉項目。

(五)胥吏盤踞。葉適的千古名言，「官無封建」（時常調任），而「吏有封建」，（都是本地人世業）。這問題直到近世始終無人能解決。

(六)尚文輕武。唐代武功盛，北宋大官都騎馬。王安石反對轎子，因為是把轎夫當畜牲用。南宋就多數坐轎了。將門子弟，蔭授武職，特別請求換為文資。連民間也是好男不當兵。國防如何能行？唐代貴族盛行馬球。北宋已極少，但南宋孝宗，還喜歡親自上場，結果臣下逐漸勸阻。從此以後，只有軍中有馬球，社會上沒有了。統治階級，缺乏體育遊戲，也是中國文化此後的特色。

(七)因為尚文，各種文學，藝術，特別是哲學，不但造詣高超，且漸趨普遍。其影響在幾百年內，

居然滲入民間。更是這文化模式最有成就的大特點。盡人皆知，無需再說。

(八)理學或道學的興起。常爲思想史所過度誇張。其實，它最切要的貢獻，還不是抽象的理論，而在具體的應用。反過來說，其應用又非純道學，而是配合其他因素，較符實際的。例如袁采的袁氏世範，其他各種家規，呂本中再傳至祖謙的官箴，按照歐蘇方法編製族譜，地方上建先賢祠，修方志，鄉民自己組織義役，以應付政府不合理的勞役徵發。總結起來說，學術增進，雖不能改善政治，可是對於社會秩序，裨益頗多。正如同中古歐洲的文化，主要是靠宗教和教會。

(九)說起社會秩序，中國靠教化，不使宗教抬頭。因此士大夫的史料，以至近代的研究，也都忽視宗教。其實，宗教在生活裡仍然是不可缺的。民間信仰，到處都有。而從略有知識的階層起到士大夫，都傾向於儒佛道三教歸一。這又是中國文化的特色。當然，唐代就講三教。但北宋還有爭議。歐陽修有本論，以固儒本來抗佛，契嵩和尚就用儒學來駁斥這種抗佛的錯誤。可是到了南宋，大致定局。

現在提出一篇久已埋沒的文獻，以作結束。南宋孝宗寫過「三教論」。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說：「大略謂之以佛修心，以道養生，以儒治世，可也。又何惑焉？」說得遠比唐太宗透澈。而在徽宗崇尚道教之後不久，便這樣說，尤可注目。基本上，孝宗是反映大多數士大夫的信仰。這樣切要的作品，不但見於正史官書，歷代儒家的文章裡，一概不提，弄得無人知之。儒家偏見之深可知。筆者幸得請教佛學史的朋友，才在大藏經裡找到。原文兩見，是佛祖統記和雲臥紀談。（附帶報告，因爲找這篇三教論，又看見大藏經裡其他兩條記載，說孝宗師事一僧，後又有御注圓覺經。）發現這些史料，才能了解朱熹何以大聲疾呼正心誠意，而孝宗也不會聽他的。

以上所說的南宋文化模式，只是蕪言，決非定論。目的是拋磚引玉，呼籲各方學人，各抒己見。中國以往八百年的文化是不是這形態？那些特點在南宋以前早有了嗎？那些特點說錯了？另外還有什麼特點？那些在南宋以後改變了？大不相同了？

黃博士年富力強，將來一定可以幫助國人了解固有文化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。更希望有更多的學人，羣起共磋。我們的史學太零碎了。分頭努力，而常互不相干。筆者並不主張硬性的，龐大的計劃研究。只是苦口婆心的勸說——互通聲氣，百川匯宗。這樣才有希望。

學問要提問題，問題要先提大的，分工去選分題，然後合作，交換意見，討論中間的錯綜層次。這不是我們職業學人應有的責任和態度嗎？

一九八五夏於美東卜林士屯大學

目 錄

代序——略論南宋的重要性……………	劉子健……………	一
論著：		
一、宋元襄樊之戰……………		一
二、辨「端平入洛敗盟」……………		一九
三、孟珙年譜……………		三一
四、程瑒與洛水集研究……………		八九
五、略論南宋時代的歸正人……………		一八五
六、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關問題……………		二三三
七、南宋與高麗的關係……………		二四五
八、高麗與金、宋的關係……………		二六五
書評：		
九、梅原郁教授編：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人名索引」評介……………		三〇七
一〇、金編：「高麗史中韓關係史料彙編」評介……………		三二七

附錄：
一一、評介宋晞教授編：「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」……………三三三

一、從塢堡到山水寨——地方自衛武力……………三四三

二、高麗與金、宋關係年表……………三八九

王德毅教授讀後感……………六二五

張存武教授讀後感……………六二九

後記……………六三三

論著

一、宋元襄樊之戰

一、引言

清顧祖禹有言「宋之亡蓋自襄樊始矣」，又說：「湖廣之形勢，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，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」（註一），金毓黻先生也說：「宋末兵弱而財匱，然支撐甚久而後亡，蓋亦有故，一由於保襄陽……」（註二），這不僅充分說明襄樊的重要性，同時可看出「宋元襄樊之戰」實為決定宋元興亡的重要關鍵。

二、襄樊的重要性及南宋的經營

襄樊位於南陽盆地南端，是由襄陽（南）與樊城（北）所結成的雙子城，漢時為襄陽縣（註三），其地形為「檀溪界其西，峴首互其南，漢水如帶縈乎東北，楚山如屏峙乎西南」（註四），形勢十分險要，能「東瞰吳越，西控川陝，南跨漢沔，北接京洛」，同時「水陸衝輳，轉輸無滯，與江陵同唇齒」（註五），自來不僅為「南船北馬」的轉口要港，有「天下咽喉」之稱（註六），更富軍事價值。晉庾亮曾說「襄陽北接宛洛，南阻漢水，其險足固，其土足食」（註七），元虞集南平樓記稱「

襄在荊豫之交，水陸之會，自古形勝之國」，讀史方輿紀要亦稱「襄陽府跨連荊豫，控南北，三國以來嘗爲天下重地」（註八），襄陽縣志稿原序曰「襄邑古名勝之區，形勢雄偉……：……群峯聳峙，衆水滌洄，城郭金湯，民物繁阜，舳艫之上下，車騎之往來，爲水陸交會第一要衝，所謂山南鎖鑰，楚北屏藩，信不誣也。」因此，曹孟德雖敗於赤壁，失去江陵，僅扼守襄陽，依然能雄視一方；東晉雖在北方虎視之下，仍能苟安，也是固守襄陽之故；有唐中葉，安史構亂，中原板蕩而襄鄆無虞，使江南資儲，能西給行在，終於將亂事救平，凡此可知襄樊在國防上的重要性，也因此成了兵家必爭之地。

當徽欽蒙塵，北宋覆亡之時，宋遺民也在江南舉趙構繼統，兢兢地從事興復之業。這時岳武穆首先注意到襄樊的重要。他說：「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之基本」（註九），於是力圖匡復，恢復之後便加意經營，此後百三十年間，生聚繁庶，城池高深，甲于西陲。可是到宋理宗端平三年三月時「襄陽北軍主將王旻、李伯淵焚城郭倉庫，相繼降北（按：指蒙古），時城中官民兵四萬七千有奇，其財粟三十萬，軍器三十四萬庫皆亡，金銀鹽鈔不與焉，南軍主將李虎乘火縱掠，襄陽爲空」（註一〇），宋將孟珙乃上奏言：「襄陽爲朝廷根本，當加經理，如護元氣，上兵伐謀，此不爭之爭也」（註一一），三年後又光復斯土，珙更留鎮襄陽，招中原精銳，繕完保聚，使復舊觀，並分屯漢北、樊城、新野、唐、鄧間，是以荊襄一地遂與四川的合州同爲長江上游的重鎮，抵禦蒙古兵的堅強堡壘。

三、忽必烈的即位與伐宋

蒙古帝國雖因西征而擴大疆域，然它的本意並非西征而是南進，故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屢有南牧之舉。憲宗蒙哥時，「答兀海瀾列堅以宋未降，請伐之」（註一二），合汗意，乃御駕親征，分三路進發，其中除蒙哥一軍受挫於合州外，皆有斬獲。皇太弟忽必烈所領的中路，更是連戰皆捷——入大勝關，次黃陂，進逼鄂城——因得蒙哥訃訊，以計迫賈似道請「畫江爲界」、「歲奉銀絹各三十萬兩匹」以和，才班師北返。

北返後，忽必烈師次龍岡新城，以諸親王及大臣「勸進」，即位於開平（註一三），並詔告天下。他的繼統因未獲「庫利爾台」的正式推舉，與蒙古傳統的選汗制度相違，他的七弟阿里不哥，及窩濶臺系宗王均表不服，先後以武力相對，故初期在「鞏固內部」的前提下，對南方的經略顯然居次要地位。但是，這並不是停止南進，「蓋忽必烈須續成吉思汗諸子從未放棄的企圖」（註一四），只要內部統一後有南侵的機會與藉口，就可展開行動，遂行其志了，適至元四年前有了幾個堅定他南侵的意志和口實（註一五），他乃先於中統二年七月乙丑下詔諭將士舉兵攻宋，更於至元四年展開侵宋的實際行動。

四、襄樊之包圍與宋之援襄

襄樊的地位既如此重要，此時又爲宋防蒙古之重鎮，故蒙古人中也有人注意此地。中統元年蒙古千戶郭侃上疏曾指出「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，其要地則荆襄而已。今日之計，當先取襄陽，既克襄陽，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，置之弗顧而直趨臨安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江淮巴蜀不攻自平」（註一六），中

統四年，「降人劉整入朝建言『宋主弱臣恃，立國一隅，今啓混一之機，臣願效犬馬勞，先攻取襄陽，撤其捍蔽，且襄陽吾故物，往昔棄而弗戍，使宋得竊築爲強藩，若復襄陽，浮漢入江，則宋可平也。』」（註一七），於是忽必烈下令徵諸路兵，命阿朮與劉整共同經略襄陽，積極備戰，到至元五年九月，元兵築白河城，始圍樊襄，五年多的襄樊包圍戰於焉揭幕。

戰爭進行時，忽必烈爲了提早結束戰爭，順利南下，曾應用下列諸方法：

一、增兵圍城：(1)至元五年八月丁巳：阿朮統兵圍樊城。(2)至元六年正月：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。(3)至元六年六月癸卯：詔董文炳等率兵二萬南征。(4)至元六年二月丁酉：簽兵二萬赴襄陽。(5)至元八年五月乙丑：以東道兵圍守襄陽（註一八），士兵總數約在十萬左右（註一九）。

二、提高糧餉：至元八年四月癸卯：敕襄陽軍士自今人月給米四斗（註二〇）。

三、切斷援路：襄樊形勢險要，只要有後援，便能久守，因此，至元四年劉整曾建議以利誘襄陽守將呂文德，結果，蒙古人得在襄陽及樊城外置樞場，並築土牆於鹿門山外，築堡於白鶴，不僅使蒙古人有了守備處，更遏止了宋南北之援。至元五年，築壘白河口及鹿門山，又築台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，自是宋軍援襄者皆不能進。至元六年正月甲戌：築長圍起萬山，包百丈山，令南北不相通。同年三月：築堡鹿門山，扼襄陽援路。六月壬寅：阿朮率兵萬五千人扼萬山射垛岡、鬼門關、樵蘇之路。至元七年八月：築環城以逼襄陽。同年十二月丁未：「張宏範言於史天澤曰：『今規取襄陽，周於圍而緩於攻者，計待其自斃也……若築萬山以斷其西，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，則速斃之道也』，天澤從之，遂城萬山，徙宏範於鹿門，自是襄陽道絕，糧援不繼」（註二一），築堡萬山，雖絕襄陽之陸

路，但呂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軍情，元將李恆乃設伏敗之，襄陽之水路亦絕（註二二）。至元九年，元將張宏範「爲流矢中其肘，裏創見主帥曰『襄樊相爲唇齒，故不可破，若截江斷其援兵，水陸夾攻，樊必破矣，樊破則襄何所恃。』從之。」（註二三）

四、訓練水師：蒙古軍隊是卓越的騎兵，利於在原野上馳騁，却不利於水戰。如今面對着恃江河之險的要地——襄樊，非以舟師不能奏效，於是至元五年八月乙酉：劉整告訴阿朮「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，惟水戰不如宋耳，奪彼所長，造戰艦習水兵，則事濟矣」（註二四），七年三月戊午：「阿朮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，必當以教水軍，造戰艦爲先務，詔許之。於是造戰艦五千艘，日練水軍七萬人，雖雨不能出，亦劃地爲船而習之。」（註二五）

五、招降呂文煥：至元八年八月乙亥：世祖詔「招諭宋襄陽守臣呂文煥」（註二六）。這時候，南宋爲了鞏固襄樊，也從事種種解圍的工作。

一、獎勵士兵以鼓舞士氣，儲糧以備久守：宋度宗咸淳五年（元世祖至元六年）八月戊寅：宋詔「襄樊將士戰禦宣力，以錢二百萬犒師。」咸淳六年六月「詔以襄鄧水陸屯戍將士隆暑露處，出錢二百萬命京湖制司給賜。」咸淳六年十月丁丑：「遣范文虎進襄樊，賜錢百五十萬犒師。」咸淳七年六月乙酉：「鎮江府轉輸米十萬石於五河新城積貯」，癸丑：「以隆暑給錢二百萬賜襄鄧屯戍將士」。咸淳八年二月丙午：「以錢二百萬給犒襄鄧水陸戰戍將士」（註二七），四月：「殿帥范文虎等督促糧運，輸之襄陽，晝夜不絕……」（註二八），五月：荊湖制置李庭芝遣兵鈴轄張順、張貴造舟漢水上游，冒重圍載鹽布餉之（註二九），六月丁酉：「以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